教学参考材料

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班
讲稿汇编

（社会主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　明

这里汇编的，是我室同志在我院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班（一九八三年九月——一九八四年一月）的讲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刘克明同志、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梁秀峰同志、中国人民大学黄文安同志在这个研究班的讲稿。我室同志的讲稿，在汇编前都作了修订和增补。全书由王年一同志负责编辑，李浚同志负责出版工作。

这个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班，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文件、《邓小平文选》、《陈云文稿选编》、《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等党的重要文献为基本依据，以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中心内容，以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为根本目的。讲稿就是力求适应这样的要求而撰写的。有的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因为研究班的同志在认识上不存在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没有作为专题写出讲稿。研究班的活动采取研究式，讲稿供研究参考。研究班结束后，根据军队院校党史工作者的要求，为交流研究成果，积累教学参考资料，汇编了这本材料，仅供内部研究参考，并征求意见。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班引言提纲……段浩然（1）
关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国“革命转变”或
“社会转变”的几个问题……林蕴晖（8）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林蕴晖（21）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几个问题……林蕴晖（42）
一九五六年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提出的几个问题……林蕴晖（57）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富裕中农问题……刘裕清（67）
关于“反右派”斗争问题……黄文安（81）
“大跃进”和纠正错误的曲折……丛　进（98）
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政治调整……丛　进（123）
“前十年”中党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失误的几个问题……丛　进（136）
成就是“前十年”的主导方向……丛　进（159）
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几个问题……刘克明（164）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王年一（184）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王年一（195）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几个问题……王年一（245）
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几个问题……王年一（255）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王年一（267）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潘贤桥（279）
关于我国经济调整和发展前景问题……梁秀峰（29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探索……张天荣（306）

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班引言提纲

段 浩 然

在同志们研究党史之前，我想就党史和党史研究的有关问题和同志们交换一些意见。对同志们的情况不甚了解，考虑得也极不成熟，仅供同志们参考，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讲三个问题：

一、党史研究的对象

同志们知道，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就我们院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而言，哲学、政经、科社、政工是这样，党史也是这样。没有自身研究对象的，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那么，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简要地说，就是党的战略策略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看法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提出，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新看法。当然，也只是一种看法、一种观点，和其他看法、其他观点一样，也还在继续研究中。

何谓战略，何谓策略呢？所谓战略，概括地讲就是革命和建设的总任务、总目标、总政策、总计划。在革命时期，它指的是打击的对象、力量的配备、要完成的任务。在建设时期，它指的是奋斗的目标、依靠的力量、要完成的任务。这些都是就总体而言的，不涉及具体问题。所谓策略，就是完成战略任务的手段和方法，包括组织形式、斗争形式、步骤、口号和具体政策等问题。策略是体现战略的，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的。用我们习惯的语言来表达，战略策略就是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道路、途径等问题。战略通常指的是总路线、总政策，策略指的是具体路线、具体政策。无产阶级政党有自己总的战略策略，也有阶段和时期的战略策略。

战略和策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只有战略没有策略的战略，也没有只有策略没有战略的策略，战略和策略的统一，构成了党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体系。

党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要领域。它不是独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外，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研究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理论，是为了指导革命的实践，研究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实践，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理论。

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要有自己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呢？为什么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党史这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就要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以及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和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

同志们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由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

分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又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著作——《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在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之后，又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学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一般原理。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本阶级和中国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的科学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以指导革命的行动。正因为这样，所以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就一直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历次重要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共开了十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哪一次代表大会不是制定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代表大会所讨论决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少数代表大会如九大、十大讨论决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错误的，个别的代表大会如十一大讨论决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有对有错，还有个别的代表大会如"五大"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不管怎么样，各次代表大会都把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保证了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保证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保证了党的巩固。错误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危害了党的政治领导，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损失，党的自身也遭到损害。可见，党能不能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党能不能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能不能胜利发展，党能不能巩固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党的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而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在党的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指引下形成和发展的。党的前进与后退，扩大与缩小，巩固与破坏，都和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息息相关。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没有正确的政策策略就没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没有党的自身的发展。

毛主席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说：研究党史要把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仅是研究哪一步，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工商业政策》一文中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毛主席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党制定和实行路线政策的过程。把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党史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把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离开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研究党的历史过程是研究不出结果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是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六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六十年，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六十年，因而，也是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走向一系列胜利的六十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能够战胜党内的黑暗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有了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相结合的历史，也主要地是由党的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体现出来的。没有正确的战略策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路线政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所以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六十年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会见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率领的法共代表团时说：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独立思考，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才取得胜利的。可见，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历史。因此，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科学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略策略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也许有的同志要说，研究党史难道只研究党的路线政策，不研究党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难道不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不研究党的传统作风吗？是要研究的。但是，研究这些问题，不能离开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否则就无法研究，因为这些问题都与党的路线政策有密切联系。不研究党的路线政策，就无法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无法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也不能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深刻了解党的传统作风。只有围绕党的路线政策，才能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才能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早在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批评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至今仍然是我们党史研究中的一个偏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党的战略策略的制定和贯彻离不开党的建设。因此，在研究党的战略策略的同时，也要研究党的学说，特别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但这不是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按照各门科学的分工，党的学说，属于党建科学的研究对象。

有些同志问，党史、军史、战史、革命史、现代史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党史研究的对象以后，自然也就知道了党史这门科学和军史、战史、革命史、现代史的区别。它们的区别是：党史研究的是党自身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说明的是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军史研究的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主要说明的是军队建设的路线、政策。战史研究的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主要说明的是战略战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革命史通常指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各革命阶级、阶层、团体、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反对三大敌人的革命运动史，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着重说明的是中国人民爱国民主的光荣传统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近年来有的同志把革命史的上限移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把革命史的范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扩大到整个民主主义革命，它所研究的内容自然就扩大了。这个问题史学界还在研究中，一时难以得出定论。不管革命史的范围怎样，革命史和党史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党史的概念和革命史的概念比较，党史的内涵深，外延狭，革命史的内涵浅，外延广，这是由它们各自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现代史和革命史又有所不同，现代史是和古代史、近代史相对而言的，它的断限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各个国家断限也不完全一样。在中国，过去把现代史的上限划为"五四"运动，下限划到现在。近年来史学界多数人主张把上限划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划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尽管有新旧之分，但都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起了变化，因此，把上限划为一九四九年十月是比较恰当的。

不管断限如何，现代史属于通史的一部分，它所研究的是现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的整个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以经济为基础为骨骼，从综合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它的概念和革命史比较内涵更浅，外延更广。这同样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因此，研究现代史的同志就要具备更为广泛的知识。当然，革命史、现代史与党史有若干重合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党史、军史、战史都是历史，从通史的角度讲，都是专史，但从它们的研究对象和课程设置上讲，党史又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列为政治理论课程。军史、战史属于军事学的范畴，列为军事课程。革命史、现代史则属于历史学范畴，列为历史课程。因此，讲党史应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讲军史、战史应着重从军事学的角度讲，讲革命史、现代史应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不能把党史、军史、战史、革命史、现代史混同起来。如果模糊了各门科学的界限，是不能搞好各门科学的研究与宣传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军史、战史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我们所说的革命史、现代史不论断限如何，就它的发展和结局而言也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党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党史的一些重要内容，但不能把党史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搬到军史、战史、革命史、现代史中去，不能把军史、战史、革命史、现代史讲成党史。各门科学既然有不同的研究对象，那么它也就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同样，党史也不能不涉及军队、战争、革命党派和团体，不能不涉及现代的经济、思想和文化；但是，它是从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角度上涉及这些问题的。并不涉及它的科学体系和具体内容。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处在领导革命战争过程中，可以说没有军队和战争，也就没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因而讲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不能不更多地涉及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战争。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因而也就不能不更多地涉及到经济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党史讲成军史、战史、革命史、经济史，否则就改变了党史这门科学的性质，使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失去了意义。

总括起来说，研究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就能掌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就能更好地说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那种把研究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和研究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对立起来的看法和说法，是不妥当的。研究和宣传党史的任务主要的就是要研究和宣传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从而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了解党的优良作风，提高我们的政策水平，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肃清“左”的影响，防止和抵制右的干扰，深刻领会党的现行的路线政策，提高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自觉性，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而奋斗。

二、关于我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教学计划规定，我们研究班要以我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为线索。因此，有必要向同志们简要介绍一下讲义编写的情况。

首先，介绍党史讲义编写的指导思想。（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十二大”精神为指针，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力求实事求是，准确地叙述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着重叙述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叙述党在历史上的三次转变阐明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同时阐明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建设的基

本经验教训，肯定党的光明面，肯定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力求讲义具有比较鲜明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以适应中高级干部的需要。（二）围绕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力求正确地说明党和人民、个人和集体、理论和实践、正确和错误、胜利和曲折、经验和教训的关系。根据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全面地、历史地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肃清“左”倾思想对党史这门科学的影响，把历史上搞乱的问题，根据事实和中央的精神纠正过来，把林彪、“四人邦”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三）适当突出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内容，体现军队院校的特点，适应军队干部学习党史的需要，但不能喧宾夺主，不能把党史写成军史、战史。（四）力求继承过去各种本子的优点、长处，避免过去本子的缺点。在各章分期问题上，我们维持了过去本子的传统分法。在论述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既要突出路线政策的地位，坚持在路线政策问题上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观点，又不能象过去一些本子那样，把两条战线的斗争绝对化，更不能象“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那样，把党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改革创新，使讲义具有时代的特点。（五）要适应教学改革、教学时间的需要，政治学院的学员是中高级干部，以自学为主，教学时间一般在四十天左右，讲义的字数不宜太少，太少了不能满足学员自学的需要；也不能太多，太多了时间不够。从教学对象、教学时间出发，我们把讲义的字数确定在六十五万字以内（现在本子六十三万字）。这些就是我们编写讲义的指导思想。

其次，介绍一下讲义的体系。根据编写讲义的指导思想，我们确定讲义的逻辑体系，大体上要由两个三段式组成。第一个三段式是指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前言，说明党史作为一门科学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略策略的科学，这是点题。二是正文，说明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党制定和实行战略策略的过程，这是破题。三是结束语，说明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思想体系和它对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合题。第二个三段式指的是每章大体上也要由三段组成。一是形势和任务，这是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出发点，是点题。二是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是破题。三是小结，是合题。这样作的好处是，能够突出讲义的主题思想，比较鲜明地说明党史这门科学的性质；能够体现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看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巨大意义，看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既能把史、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又能比较集中地突出理论问题，形成各章的理论重点，使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一致。这就是讲义的基本体系。

再次，讲一下讲义的内容。根据讲义的指导思想，在讲义的内容安排与选择上，我们确定了以下原则：（一）内容要切合党史科学的主题，切题的就选，不切题的就不选，不能把讲义写成大事年表，更不能写成流水帐。（二）在符合主题的前提下，内容要尽量充实，尽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既要写苏区，又要写白区；既要写中央苏区，又要写其他苏区；既要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又要适当写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既要写党和革命的方面，又要写敌友方面。力求体现毛主席说的“古今中外法”。不能搞一个地区、一个方面、一个领袖、一条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写革命，也要写建设；既要重点写经济建设，也要写其它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三）要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同志以及党的早期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中央的决定、指示，作为讲义的重要内容，并作为讲义具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尺度。在材料的使用上，尽可能地选用原始资料，重视吸收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不论是原始材料或

是研究成果都要鉴别、选择，不能有闻必录，照抄照搬，把讲义变成资料汇编。（四）要贯彻“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仅社会主义时期要这样，民主革命时期也要这样。这不仅是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且是党史这门科学性质的要求。搞得过细了，就要脱离党史这门科学的主题，降低讲义的质量。要考虑扩大学员的知识面，适当充实讲义的内容，但不能投其所好，满足一些人要多听新鲜材料的猎奇要求，乱抛资料，甚至把一些无关的问题写进讲义中，这样做，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学术上讲，都是有害的。（五）为了补救学员基础知识的不足，我们在讲义的正文之外，又写了必要的注释，同时编写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大事简介，明年还准备编写民主革命时期的大事简介，作为辅助性的读物。为什么不把注释和简介的内容写进正文，而另起炉灶呢？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写进正文，党史就变成史料汇编，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最后，讲一下编写中遇到的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资料缺乏。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也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是自力更生，自己出去搜集、挖掘；二是上面讲到的充分运用社会的研究成果，以补不足。有些章节吸收社会成果较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讲义也是社会的共同成果。即使这样，资料也还不够，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白区工作尤其如此，讲义虽有所体现，但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已经写在本子上的有些史实，也不一定完全准确。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逐步解决，空白逐步填补，史实逐步订正。编写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对待某些不同的观点。我们的态度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既尊重事实，又遵守纪律。编写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理论准备不足。尽管作了努力，但仍没有把党的战略策略思想很好地表述出来，有些地方还有不够准确之处。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们编写讲义的一些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还存在着许多缺陷，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将在进一步修订之后，以《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为题，正式出版。

三、如何贯彻研究式

我们的名称叫研究班，要想研究好，有收获，有成果，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我们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时期。要搞好这个重点的研究，就要认真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文件、《邓小平文选》、《陈云文稿选编》、《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三中全会以来》等党的重要文献，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从方针、政策的高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系实际，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肃清“左”的影响；认真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出发点和目的。

（二）贯彻自学为主的原则。按照教学大纲和阶段实施计划，认真阅读规定的文件，独立思考，刻苦钻研，搞清是什么，为什么，确实掌握文件的精神实质，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把文件的精神实质表达出来，联系实际说明问题，回答问题，这样才能打好理论根底，研究出成果来。要求同志们自学，并不是说教员可以撒手不管，教员的任务是和大家一起研究，帮助大家制订单元学习计划，该说的说，需要在小组说的就在小组说，需要在课堂上讲的就在课堂上讲，能发讲稿的就发讲稿，不能发的就不发，发了讲稿需要讲的就讲，不需要讲的就不讲，教员在小组说的，课堂讲的，包括我今天讲的在内，都是供大家参考的，不是定

论，只是帮助大家领会文件精神，不能代替文件，大家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对外宣传一律按中央的口径，执行“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这样说来，大家到这里来是不是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最近钱抵千副院长在讲《邓小平文选》的学习时说了一段话，他说：集中学和分散学不一样，有计划有目的地学和无计划无目的地学不一样。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适用的。固然，同志们在家里也可以研究，但时间精力都不如在这里集中；据同志们讲，条件也不如这里好。尽管我们的准备还有不足之处，还不一定满足同志们的需要，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还有所准备，总还为同志们创造了一定的研究条件，只要同志们贯彻自学为主的原则，刻苦钻研，是可以研究出成果的。

（三）怎么自学。首先要把必读的文件学好，而后进一步阅读参考文件，在个人钻研、消化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就能加深理解，学出成果。在读书过程中，要边读书，边写心得体会，把读书消化的结果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读书、研究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从本单位的教学实际出发，不要照抄照搬。教学计划和单元实施计划，每一位同志都要执行，但执行也要从实际出发，在计划的范围内允许各个组、各位同志选择自己的侧重点。读书、讨论都是这样，不要搞一刀切，同志们都希望多发点资料，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同行，和同志们一样，也深感资料缺乏的苦处，为此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编印了三本《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给大家。这三本资料在当前来说，是我们努力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即使同志们希望殷切，也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务请同志们予以谅解。

（四）发扬教学民主是搞好研究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研究班过去我们办过几期，但时隔已经几年，情况较过去有了很大变化。这期研究班是在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开办的，研究的内容和重点，同过去比都有很大的不同，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办好研究班，我们还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发扬教学民主就尤为重要。希望同志们在执行教学计划的前提下，献计献策，群策群力，把我们的研究班办好。同志们来自教学的第一线，有经验，有基础，有研究问题的愿望，这是我们办好研究班的基础和条件。我们愿意和同志们一起努力，把研究班办好。预祝同志们学习胜利。

（一九八三年九月）

关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国“革命转变”或“社会转变”的几个问题

林　蕴　晖

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革命转变”或“社会转变”的问题，曾经有过三种提法：一、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这三种提法，从表面看似乎每个提法有它不同的角度，实际上却涉及在我国是否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我国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根据前一段党史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下面谈一点个人意见，以期共同研究。

一、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它指导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搞民主革命，第二步搞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第一步取得胜利以后争取立即就开始第二步。这个思想，是我们党根据列宁的思想，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二大”宣言中说：无产阶级的第一步是争得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对付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但是，在我国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则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摸索才逐步找到正确答案的。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由不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到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最后退回到“二次革命论”，背弃了二大宣言。

党的“六大”坚持了经过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但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下，瞿秋白、李立三同志和王明教条主义者在革命转变问题上，又主张“毕其功于一役”。

瞿秋白同志认为：“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

李立三同志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同时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②。

王明教条主义则认为：“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③。

既然在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同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也就不存在革命的转变问题。这个观点也和二大宣言、六大决议不合。

毛泽东同志则明确主张革命转变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结合。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中国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④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⑤但是，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上仍然还没有解决。直到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〇年初，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系统地阐明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⑥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和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又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它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⑦，“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⑧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把两个革命阶段联结了起来，可以不用再次夺取政权直接完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而找到了在中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党的七大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正式写进了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的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

（二）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既不能超越，也没有别的什么形式可以代替。最根本的原因是，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十分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展。

一九四九年，我国现代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八十三。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九五三年全国总人口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人，农村五亿零五百三十万人，占百分之八十六点七四）。农业生产基本上使用着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手工工具。一九四九年粮食总产量为二千二百六十亿斤，人均粮食三百七十斤。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

仅有的一点工业，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只是一些修理和加工工业，没有独立的工业基础。而且百分之七十集中在沿海的几个省、市。发展极不平衡。虽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掌握了主要的工业部门，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只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公私合营工业占百分之二，私营工业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一九五〇年占百分之十四点九，私营商业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一。私人资本主义还占着相当

的比重。

与经济发展落后相应的是科学文化落后，文盲众多（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⑨胡耀邦同志一九五五年十月在青年团二届四中全会上说："农村单是一亿青年中，就有七千万左右是文盲和半文盲。"）。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少（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按此推算，建国初期讲师以上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足七万人）。

以上情况说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一面。因而在全国胜利以后，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是不适宜的。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因为在中国，"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⑩

值得指出的是，十年内乱期间批判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极力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无耻颂扬资本家'剥削有功'"等等，完全是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应该肯定，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的。在当时，对于纠正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一部分同志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倾向，稳定民族资本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讲话中的个别词句欠妥，那只是具体的用语问题。

由于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领导地位，由于没收了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又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共同纲领》。这就使继续和资产阶级保持同盟，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一面，限制其消极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转变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

对于当时我们党为什么规定这样的政策而不规定别样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⑪这就从理论上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回答，即革命在全国胜利，我们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这就是我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起点。

（三）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毛泽东同志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范围胜利的前夕，党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对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作了明确规定。

二中全会决议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决议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允许其存在及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规定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是：利用，限制。而不是采取立即消灭的方针。

根据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由我党提出、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是，"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一届政协会议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有人建议在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部分写上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话。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解释了暂时不写的理由，他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⑫。

为了防止党内"左"的思想倾向发展，七届三中全会规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

七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规定的正确方针，以及随后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保证了我国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以上三点说明，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的效果来看，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提法都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提法，是对列宁的话作了教条式的理解；是和我国当时的历史实际及党的政策不相符合的。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所谓"四大自由"的批评，是不恰当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

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⑬这是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总路线的一次谈话中首先提出的。党中央接受了这个提法，随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作了宣传。

对这种提法所作的解释，大体有这样几点，一是说列宁说过政权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二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强调没收官僚资本的社会主义性质。

（一）关于列宁的几段语录

通常引用的列宁语录，主要是两段：“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⑭政权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⑮由此说明我国的全国政权一建立，革命性质就转变了，主要任务也转变了。为此，我们就要弄清楚列宁的话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是否是一个不变的公式可以到处去套？

以上第一段话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中讲的，第二段话是同年九月，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讲的。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历史状况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封建沙皇统治，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不懂得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重要性，不去动员群众为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斗争，继续在那里重复民主革命的老口号，说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土地革命没有开始等等。这就是列宁发表以上文章的最基本的背景。

列宁在《论策略书》中引用哥德的《浮士德》中的一句名言：“我的朋友，理论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列宁说：“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来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又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⑯这样，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问题，是教条式地等待资产阶级政府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完成民主革命呢？还是依靠已经出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去夺取全部政权。对此，列宁回答说：“在我的提纲里（指《远方来信》——引者注），我指出‘俄国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⑰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是，“准备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取得胜利”⑱，即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胜利。

九月，列宁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进一步阐明了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还是在无产阶级手里对革命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列宁尖锐地提出，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或者是解散苏维埃，让它不光荣地灭亡；或者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中间路线是没有的。经验也证明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只有政权归苏维埃才能使革命逐步地、和平地、

平稳地发展”⑲。

由上可见，列宁关于政权在那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的一切问题的话，从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或者说政权对革命的重要性而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就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准备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又是针对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具体情况说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列宁上面的话当作一个公式去套，不管哪个阶级夺得了政权都是民主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因为政权的更迭引起对革命进程的影响，是由各个国家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夺得政权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这一条，就使中国无产阶级不存在再次夺取政权的任务。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能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转变到社会主义。因此，用列宁的上述语录来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既不符合列宁的原意，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

我们过去在对待马列著作的态度上，有一种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就是把马列的话，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抽出来，把它加以绝对化然后到处套；或者为了说明我们某个观点，到马列中去找根据，为我所用。实际上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

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明确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说明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必须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改变的。”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论断，恰恰是和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不互符合的。

（二）关于建国初期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和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

首先明确一下主要矛盾的概念，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对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对于建国初期主要的阶级矛盾，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作了透彻的分析，作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只是没有用主要矛盾这个词表述。他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㉑为此，三中全会规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因为，不继续解决人民大众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国民经济就无法恢复，也就谈不上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所以，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呈现了一个前后交替的复杂过程。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明确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为了不致引起误解，一九六〇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毛泽东同志对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的有关段落作了校订，即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一句，改

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主要阶级矛盾的说法，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主要矛盾，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理由：一是没收官僚资本解决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资本主义问题；二是稳定物价和“五反”运动主要矛头都是打击资产阶级的；三是土改中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富农的问题。下面分别谈谈这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没收官僚资本的性质

没收官僚资本，第一次提出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同时宣布“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在党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㉒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㉓毋庸置疑，上述结论表明，没收官僚资本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的。

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教科书说：中国在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又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就没收官僚资本的意义来说，指出它具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重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说没收官僚资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又是极不准确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一定质的规定性。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来说，反官僚资本主义究竟是属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说主要方面是什么？如果着重强调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那末一九四七年提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就成了“毕其功于一役”。如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和以后来区分没收官僚资本的性质，在这以前属民主革命，以后属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表现了一种主观随意性。

第二，关于建国后稳定物价和“五反”斗争的性质，是限制资本主义还是消灭资本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允许其存在及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都是要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的”。“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形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